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陈 钊

[摘要]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关键词] 甘肃 雷马事变 蒋介石 杨虎城

1931年8月25日,驻防兰州的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联合甘肃省主席委员、原国民政府派驻甘肃的视察员马文车,发动政变,以“庇匪殃民”“把持财政”等罪名,囚禁甘肃省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马文车自任临时政府主席,雷中田任甘肃保安司令,是为雷马事变。雷马事变是30年代甘肃乃至西北政局的转折点。事变之后,甘肃地方军事势力遭到削弱,杨虎城以甘肃为跳板,向大西北发展的计划受挫,南京中央势力开始直接控制西北。

雷马事变虽发生于远距民国政治中心的区域,但事变前后,全国性、地区性、省级、地方级各派势力或明或暗,纷纷登台,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现有对雷马事变的研究,或侧重吴佩孚与事变的关系,或侧重事变对甘肃政局的影响,或注意到冯玉祥在事变前后的重要作用。而对事变处理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蒋介石、杨虎城,以及蒋、杨之间在事变处理过程中,因各有所图而暗中博弈的复杂关系,却甚少予以关注。本文利用台湾“国史馆”刊布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和新近出版的几种资料,力图还原雷马事变中蒋介石、杨虎城的博弈过程,并借以呈现抗战前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一些侧面。

一、事变前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杨虎城本为冯玉祥部属,因冯对之苛刻,先是

被迫出洋,回国后便起离意,1929年离冯附蒋,部队番号改为新编第十四师。离冯附蒋后的杨虎城,在蒋冯、蒋唐战争中,功勋卓著,被蒋介石委以大任,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从此成为相对独立的地方实力派。但杨虎城的抱负远不止此。杨的重要谋士杜斌丞早就建议杨实行“西北革命大同盟、南北革命大联合”,也就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时人称之为“大西北主义”。这得到杨的赞同。实现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王劲:《雷马事变与吴佩孚的出山——述论吴佩孚在民国政坛的最后一幕》,《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论吴佩孚晚期甘肃之行的几个问题》,《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王淑芳:《“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陈兴唐、韩文昌、潘缙贤:《冯玉祥与甘肃雷马事变》,《民国档案》1986年第3期。金以林:《宁粤对峙前后的冯玉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150页。对雷马事变经过较为完整、详细的描述见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67页,亦可参见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4-348页。关于雷马事变中杨虎城与邓宝珊的关系,参见王劲《邓宝珊传(增订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108页。

马文瑞、刘澜波、王炳南、孔从洲、常黎夫:《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杜斌丞(增订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大西北主义”,控制甘肃是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1931年春,杨虎城派李志刚到庐山面见蒋介石,以“诚恳而坚决的态度”表示“将陕西军政大权交与中央,自带部曲西进,作肃清西北的先头部队”,希望以此“探出蒋是否要直接完全控制陕西;继续取信于蒋”,其要求一旦获准,杨就可率部深入西北,“有广阔发展的天地”。但蒋介石没有批准杨的这些请求。这是杨虎城向西北扩张实力的第一次努力。

1931年6月11日,因原洛阳行营主任顾祝同东调,蒋介石下令,任命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代理洛阳行营主任。五天后,洛阳行营改称“潼关行营”,仍以杨为主任。据《潼关行营办事大纲》规定,潼关行营主任有“承总司令之命,统理西北一切军令军政事宜”之大权,是为西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杨虎城获得实现其“大西北主义”的合法身份。同月,蒋介石亲笔致函杨虎城:“诸事请兄斟酌情形,全权处理”,显示对杨虎城还比较信任。

杨虎城升任潼关行营主任不久,甘肃省府主席、中央陆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甘肃保安第一大队指挥李贵清,甘肃保安第一警备司令陈璋等甘肃各路诸侯均致电杨虎城,陈述“甘事”。此时的杨虎城,虽已拟订“整理西北工作计划”,但还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直接插手甘肃军政。

雷马事变的爆发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据马文车自传所说,雷马事变发生后,杨两度派代表赴甘活动,先提出“甘局归杨统辖”,继提出“军事归杨领导,政治由甘自主”,但均为马文车、雷中田拒绝。长期担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米暂沉在其《杨虎城将军传》中透露,杨派孙蔚如率师入甘,“有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另创新局的打算”。

二、事变之初蒋杨的对策

雷马事变发生三天后,杨虎城致电蒋介石,报告所了解的情况。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从马鸿宾的叔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处了解到事变经过。对于蒋介石来说,雷马事变并不算大威胁,蒋最初的方针是政治解决。实际上,早在平定石友三叛乱后,蒋介石就“决定除赤匪以外,对其他各方叛逆,……皆谋政治方法解决一切也”。这显然是针对两广的。之后的雷马

事变虽然事属突然,但无论事变规模还是发生地区的重要性,都远逊于两广,“谋政治方法解决”自不在话下。

30日,蒋介石致电雷中田,令其转令马文车:“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⑩这封电报引起马文车的极大担忧,害怕雷中田会扣押他,派人到雷处探口风,在得到雷的保证后才放心。除了以中央的身份表态,蒋介石并没在处理雷马事变上投入多大精力。9月2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甘事请兄负责处理”,“俾维中央威信”^⑪,将处理雷马事变的大权授予杨虎城。此后,蒋虽几度考虑雷马事变问题,一度还认为事变“颇难处置”^⑫,但主要精力仍放在“剿共”和对付两广上。

杨虎城得到授权后,于9月2日、3日连电马文车,要求释放马鸿宾,恢复其职务。^⑬4日,马文车致电杨虎城,称已将马鸿宾放回住所,但是“默察环境”,马鸿宾“恐难折服甘民”,因此无法恢复其职务。^⑭6日,杨虎城再次致电雷中田、马文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38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36-238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1页。

金沛仁对《雷中田、马文车联名致函杨虎城表示靠拢,并派李世军面谒的函稿》(1931年9月23日)的按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163-164页。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4页。

高素兰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1931年8月2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478页。

^⑩ 《蒋主席处置甘政变》,1931年9月2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上海《民国日报》第94分册(1931年9-10月),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94)14。

^⑪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4页。

^⑫ 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3日、5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37、38页。

^⑬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4、245页。

^⑭ 《甘变由马文车负责杨虎城调解无效》,1931年9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上海《民国日报》第94分册(1931年9-10月),(94)94。

车,再次要求“迅速恢复马主席鸿宾自由,俾得行使职权,以维中央威信。并制止对陇南马廷襄(贤)部用兵,俾维和平,而固边防。”但马文车仍未遵命还权。

9月7日,蒋介石再电杨虎城:“甘省政变,经查明全系视察员马文车擅作威福构成,将省主席马鸿宾私行扣留,已严令立将马主席恢复职权。复未遵令办理。似此坏法乱纪,非严惩祸首,何以肃法纪而遏乱萌?除电令雷师长中田、高公安局长振邦及陈、鲁两警备司令,将马文车立予拿解来京究办,其余胁从概免深究,并转知马主席即日召集各委员行使职权外,仰即协助办理,以维地方,而肃法纪为要。”直到此时,蒋的方针仍是政治解决事变,恢复原有秩序,即重新建立以马鸿宾为主席的甘肃省府。

但杨虎城一方面在按蒋的意思,“政治解决”事变,另一方面,派在陕甘颇有声望的杜斌丞入甘了解详情;并将寓居上海的甘肃籍将领邓宝珊请到西安,准备派其入甘,为其他可能的解决途径做准备。这引起蒋介石的警觉。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甘肃之事,恐难一时了结。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杨虎城亦有推邓宝珊之意。其内情复杂如此,恐非由中央派员往治,不能平也。”这说明蒋开始改变初衷,有了撇开杨虎城,由中央直接出面解决事变的设想。

实际上,蒋虽然公开声称让杨虎城全权处理事变,但一直没有完全放手。7日,蒋致电雷中田、省城公安局长,要求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8日,蒋再电高振邦,除催促拿办马文车外,并称赞其“护卫地方,勤劳素著,此次省会发生事变,尚能维持秩序,殊堪嘉许”,嘱高将处理事变情形,随时电陈。蒋在头一天致电雷、高,第二天却单独称颂高振邦,显已知道雷、高之间的隔阂。显然,蒋一方面要求杨虎城代表中央出面调解,另一方面也试图利用甘肃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从内部解决事变,防止杨虎城借题发挥,扩大势力。9月15日,蒋介石致电杜炳章,告以:“甘肃政变影响西北局势颇大,着令黄逸民师长率部进驻甘肃,其地点及计划盼详复”。调川军北进甘肃,蒋防杨的意图就更明显了。

9月10日,杨虎城派代表王宗山到京,向蒋汇报调处雷马事变经过。据王讲,杨虎城对事变中“不服中央命令者,决力为制止”,此处的“力”

显然已不是一开始的调处,而带有“武力”的意思,只不过在没得到蒋介石的首肯时,杨还不便贸然出手。

这一阶段,蒋介石多管齐下,既公开让杨虎城出面解决事变,又暗中发动甘肃内部势力,甚至不惜调用川军,以防万一,但蒋此时还并不特别重视雷马事变。

三、九一八后蒋杨的暗中博弈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开始通盘考虑对日作战,昔日政治聚光灯照不到的边区甘肃,变成战略纵深后方,重要性突显出来。为长远计,蒋必须牢牢控制西北。同时,杨虎城在事变中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力向甘肃渗透的行动也引起蒋介石的高度警觉。

9月26日,蒋介石在考虑对日战略时,“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军队主力于陇海路严阵以待”。10月3日,蒋在与熊式辉谈备战计划时,进一步明确“西北实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沦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⑩。西北的战略地位骤升,蒋对雷马事变的重视程度必然相应增加,但因处理九一八事变和随之而起的汹涌学潮,蒋一时还抽不出身来全盘考虑雷马事变。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5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5-246页。

这是杜斌丞因雷马事变首次入甘,参见靳英辉、李长林编著《孙蔚如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因邓宝珊公开反蒋,而且一直不认错,蒋不同意邓插手,雷马事变,见孙伯泉《欢迎邓宝珊先生回甘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甘肃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1页;《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朱文原主编:《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第1册,(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第291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11日,第62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8日,第56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15日,第73页。

《杨虎城代表昨到京》,1931年9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第1张第3版,上海《民国日报》第94分册(1931年9-10月),(94)13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26日,第102页。

^⑩《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10月3日,第129页。

杨虎城则利用蒋无暇西顾的时机,积极为武力解决雷马事变做准备。10月8日,杨虎城在新城大楼接见驻甘肃平凉的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一璋,听取陈关于军队状况及陇东最近情形的报告。10月30日,杨虎城再派杜斌丞入甘,名为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一璋、新编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送委任状及关防,实际则是取得陈、鲁对杨出兵甘肃的支持。大约与此同时,传出杨虎城派十团武装入甘,阻止川军北进的消息。

雷马事变发生后,蛰居甘南的原北洋军将领吴佩孚,利用各方僵持不下的局面,以自己的老资格出面斡旋,促使雷中田释放马鸿宾,并图谋在甘各派势力拥其出山,这使本来接近尾声的雷马事变重行复杂起来,也为杨虎城出兵甘肃提供了良机。据李志刚回忆,某天,陕西省民政厅行政人员训练所所长耿寿伯(吴佩孚任直鲁豫巡阅副使驻节洛阳时,耿为胡景翼的代表,长驻洛,耿与吴的第三师副师长张儒清又是甥舅,所以与吴很熟)忽接到吴佩孚亲笔信一封,要耿从中运用和杨合作。耿立即把吴信交杨看。杨看后笑对耿说:“这是个很好的题目。”此时九一八事变已过月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蒋介石开始全面考虑抗击日本侵略问题,西北渐入其视野,杨虎城再不出手,将丧失控制西北的良机。11月5日,杨虎城致电蒋介石,称吴佩孚“乘甘变严重时期,带队入甘,滥发师长、司令及旅、团长等名义之委状。窥其用意,实有乘机窃据之势”,请示蒋是否可令“甘青各将领将吴扣解来陕,再行转送中央办理”?杨明知甘青将领对吴佩孚依违两可,举棋不定,蒋大不信任,却建议用他们扣解吴佩孚,正是想利用这个“很好的题目”,借题发挥,逼蒋同意其出兵甘肃,试探对甘动武的可能性。蒋不中其计,回电说“对吴可严密监视其行动,力促其来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杨虎城不得不暂时放弃武力扣押吴佩孚的设想,转而电请其“速驾入京”。

11月14日,杨虎城发布《告甘肃民众书》,宣布出兵平定雷马事变^⑩。17日,先头部队入甘,20日,杨部第十七师师长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身份正式率师出征。^⑪

正在孙蔚如部征战甘肃的紧要关头,潼关行营也处于撤销之中。经杨虎城争取,行营虽得以

保留,但这个名头成为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蒋随时可以让其掉下来,使杨失去以中央身份进军甘肃的“合法性”。潼关行营是如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致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函中所说,因为“本部结束曾经电令撤销”^⑫,还是蒋介石看穿杨虎城出兵的意图是想扩大在西北的势力范围,而对其采取了组织措施,不得而知。可知的是,这个暂缓撤销行营的命令事实上使杨虎城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继续前进,一旦潼关行营于哪天撤销,入驻甘肃的部队不免“妾身未明”,不得不回撤至陕西,艰苦熬战的战果势必拱手送给蒋介石;如果马上撤兵,则显得此前动机不纯,说不定还可能担上擅自用兵侵略邻省的嫌疑。但事变发展到此,杨只有让孙硬着头皮继续前进一途,希图形成占据甘肃的既成事实,迫蒋承认。

除了在撤废潼关行营上先着一子,以中央的身份把握住解决雷马事变的主动权外,蒋介石一改11月初不赞同杨虎城派兵入甘的态度,一面于

据杨虎城第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的回忆,杨在接任潼关行营主任不久,即有派兵入甘解决雷中田部的打算,只是蒋介石主张对甘不要用兵,以政治方法解决,才不得不作罢,见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6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49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4页。

王克江、甄载明:《杜斌丞先生在甘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杨虎城派兵入甘》,1931年11月2日《中央日报》,第2张第3版,《中央日报(一九二八——一九四九)》第16册(一九三一年十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16]395。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7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11月7日,第250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5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5页。

^⑩ 杨出兵入甘之际,正值国民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方酝酿逼蒋下野正急。此次出兵是否得到蒋介石批准,就笔者查阅范围,未见直接证据,但10余日后,蒋似乎改变了7日的立场,同意了杨出兵(见下文)。另据时为潼关行营办公厅主任的陈子坚回忆,杨虎城事前致电蒋介石,请求派孙蔚如率师入甘平乱,“蒋不得已,复电照准。”见陈子坚《回忆杜斌丞二三事》(《杜斌丞》(增订本)第177页)。

^⑪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7页。

^⑫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8页。

11月27日致电杨虎城,鼓励其增加兵力,继续前进;一面致电马鸿宾,要求其与孙蔚如切实联络,“一致行动”。一致行动云云,自然是不让孙抢了先机,独占甘肃,而希望马鸿宾也分得一杯羹,便于蒋居间利用各方势力操控甘肃的策略表达。

12月9日,十七师一部攻入兰州,次日孙蔚如致电杨虎城,报告军队布防和兰州原军事实力逃亡情况:“(一)四十九旅今日上午8时完全占领兰州,秩序井然,望勿念。弟为维持治安责任起见,由行营委杨子恒(渠统——引者)为兰州警备司令。(二)新十三师驻拱星墩一带。(三)五十旅及新十一旅驻定远镇一带。(四)雷逆南窜后尚未得报,高逆镇(振——引者)邦率所部及省会公安局晚10时保吴佩孚、马文车、李克明等北渡黄河投往马鸿宾处。”将雷马事变中保护“合法”省主席马鸿宾有功的兰州公安局长高振邦称为“逆”,孙蔚如的目的显然是要推倒甘肃原来的行政架构,重敲锣鼓重开张。三天后,孙蔚如组建“甘肃省临时维持委员会”,自任委员长,行使省政府职能。

除出兵征讨外,杨虎城还利用甘肃地方党务整理委员会,为其控制甘肃制造舆论。12月上半月,杨虎城连续转呈甘肃省各县党务整理委员会电报,转达甘肃人民希望驱逐吴佩孚出甘,“以遏乱萌而安大局”的愿望。

杨虎城原打算独占甘肃,以为扩张西北的第一步。但蒋介石决心不让杨的计划实现。12月15日,国民政府突然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一举将陕军入甘定性为临时性质。同日,蒋介石参加的国务会议议决改组甘肃省府,以邵力子为主席。但以邵力子为主席也不全是蒋介石的意思。据李志刚回忆,杨本想以孙蔚如或邓宝珊为甘肃省主席,见蒋不同意,退而求其次,在蒋系人马中提接近十七路军的邵力子,蒋迅速同意。杨随之在征得邵力子同意后,先斩后奏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

由于杨虎城在任用孙蔚如还是邓宝珊执掌甘肃政局上举棋不定。孙心中不满,曾表示:“我们把饭做熟了,却来了个婆婆。”^⑩1932年元宵节,孙枪杀力主邓宝珊回甘的地方实力派、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陈^三璋^⑪,激化陕甘省籍矛

盾^⑫,使陕军在甘更难立足。杨虎城要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自成一格局,他的部下也免不了有这种思想,孙蔚如便是一例。这最终使杨虎城的“大西北主义”在实施第一步时就遭受重大挫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11月27日,第421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12月3日,第438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60页。

雷马事变爆发后,雷中田下令全城戒严,抓捕国民政府任命的合法甘肃省主席马鸿宾,马在无法逃出省城的情况下,考虑到省会兰州公安局长高振邦和他的儿子关系不错,逃至高处寻求避护。高以软禁的名义将马保护起来,没有交给雷中田。见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编辑》第2辑(修订重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4页)。蒋似乎也知道这点,故在给高振邦的电报中说“此次省会发生事变,尚能维持秩序,殊堪嘉许”。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9月8日)第56页。

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第67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59-261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61页。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2,民国二十年九月至十二月》,1931年12月15日,第460页。

李志刚:《回忆杨虎城将军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17页。

^⑩ 杨子实、石佩玖:《记西安绥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邓宝珊将军》,第96页。

^⑪ 据陈师政治处长孙伯泉回忆,雷马事变前,他曾到上海面见邓宝珊,希望邓回甘主持大局。12月底孙回到甘肃平凉后,“把会见邓先生详细情况写一密函,专差送兰州交陈^三璋亲自拆阅。陈阅后疏于保密,被参谋武子平(孙蔚如介绍的)偷看后将邓先生决定回甘消息,告知孙蔚如。孙深悉邓在西北素孚众望,如一旦回甘,于他不利;同时感到平凉是甘肃门户,陕甘交通要道,如果由陈部长长期驻守,于陕军联络很不方便。遂不顾大局,同杨子恒阴谋杀陈阻邓。”见孙伯泉《欢迎邓宝珊先生回甘肃》(《邓宝珊将军》,第89页)。

^⑫ 雷马事变发生后,甘肃各头面人物纷纷电请中央出面解决,当代表中央的杨虎城出兵入甘时,他们又极不情愿。1931年9月7日,马福祥致电杨虎城,谓“甘事一再烦劳”云云。(《杨虎城年谱》,第246页)甘事本为杨职权范围内事务,但“烦劳”二字却结结实实将甘肃划入马家自留地,而将杨置于客卿地位。11月19日,马福祥再电杨虎城,感谢其解救马鸿宾,称呼杨虎城的头衔不是杨在意的“潼关行营主任”,而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再一次坐实杨的客卿身份。(《杨虎城年谱》,第257页)雷马事变中的甘肃籍人物的事后回忆评论并不认为孙蔚如是潼关行营的参谋长,而突出其入甘抢地盘的“陕”军角色,参见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丁焕章的《甘肃近现代史》(第344页)、师纶的《西北马家军阀史》(第66-67页)也持此观点。蒋介石也知道“甘肃自陈^三璋解决后,甘军对虎城、蔚如多生反感”,见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3,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至三月》,1932年3月7日,(台北)“国史馆”2004年版)第371页。

折。事后,杜斌丞极为痛心,认为“失此一着,全盘皆输”,并“对杀陈之举,长期引为憾事”。

1932年3月7日,“行政院决议,准西安绥靖公署在甘肃设置行署,委任邓宝珊为主任”。5月6日,甘肃省主席邵力子率甘肃省府委员通电就职,孙蔚如兼任省政府委员。次日,甘肃省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任命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同日,杨虎城以杨渠统为陇东绥靖司令,段象武为兰州警备司令。通过种种人事安排,杨虎城保持着对甘肃的重大影响,雷马事变以蒋、杨妥协而告结束。

四、结语

雷马事变初起时,杨虎城就任潼关行营主任不久。杨迅速抓住潼关行营主任这一合法身份,争取到解决事变的主动权,趁势扩大在西北的控制范围。雷马事变处理中发生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穷于应付外交危机和学潮,不得不将处理事变的大权委诸杨虎城。但蒋每每在关键时刻,祭起“中央”的名器,下闲棋,布冷子,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

事变以蒋、杨暂时妥协告终,看似不分输赢,但蒋介石从此开始直接控制甘肃,局面对杨虎城越来越不利。1932年1月2日,国民政府下令,特派杨虎城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比之潼关行营主任,杨的权力大幅缩水。1933年3月,蒋军第一师进入甘肃,分驻兰州、天水等地,原驻甘肃的孙蔚如部则被调到汉中。5月,蒋介石以朱绍良为甘肃省府主席,9月,朱兼驻甘绥靖主任。11月,中央令邓宝珊“结束驻甘绥靖行署事务”,

出任新一军军长。1934年8月,甘肃省府秘书长杜斌丞去职,杨虎城的势力基本退出甘肃。

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间复杂的关系。国民政府虽然在1928年宣布完成统一中国,但尚无力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范围,不得不将统治权委诸实力较强的地方军事集团。地方军事集团则以“中央”为名器,实现着自己的图谋,分裂着“中央”。但“中央”之权威并非一直虚悬,一有机会,吊在半空的“中央”便会坐实,实实在在统治之前不得不“托管”的地区。

[陈钊: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博士生、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邮编:210094]
[责任编辑:胡震亚]

王克江、甄载明:《杜斌丞先生在甘肃》,《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20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69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72、273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73页。

贾自新编著:《杨虎城年谱》,第264页。

于凭远、罗冷梅编纂:《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9-50页。

刘寿林、万仁元、王玉文、孔庆泰编:《民国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18页、450页。

《邓宝珊结束行署事务》,1933年11月7日《申报》,第2张(8),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310]216。

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第919页。

· 书 讯 ·

天津市档案馆主编,周利成、王向峰编著的《旧天津的新生》一书,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分为“镇压反革命”“肃清潜伏特务”“取缔反动会道门”“取缔封建把头——脚行”“禁烟禁毒”“取缔娼妓”“收容乞丐”等七个部分,以天津市档案馆馆藏为基础,用通俗的语言及近200幅珍贵图片,真实再现了建国初期天津市公安部门与各种反革命、敌特分子展开的一场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详细地记述了旧天津烟毒、娼妓、乞丐、反动会道门的发展历史及被彻底铲除的过程。